

BOOKMAN TRANSLATION LIBRARY

翻譯研究 與跨文化交流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高亮 (Leong Ko) · 陳平 (Ping Chen) 主編

翻譯研究與跨文化交流

高亮(Leong Ko)・陳平(Ping Chen)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翻譯研究與跨文化交流／陳凌等作；高亮，陳平主編。

—— 臺北市：書林，2013. 09

面：公分

ISBN 978-957-445-550-8(平裝)

1. 翻譯學 2. 文集

811.707

102014787

譯學叢書 44

翻譯研究與跨文化交流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主 編 高 亮、陳 平
作 者 陳 凌、王金岳、陳宏淑、張傳彪、鄭 中、熊 俊、王 憲
陳 平、劉曉梅、姜文英、王禮彬、高 亮、陳 寧、林燕玲
謝鵬璇、侯金香、江吉娜、江哲彥、李 瑋（依論文排列順序）

校 訂 林茂松、蘇正隆

編 輯 陳薇帆

校 對 王建文

封面設計 徐子婷

出 版 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Tel (02) 2368-4938 · 2365-8617 Fax (02) 2368-8929 · 2363-6630

100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0 號 3 樓

北區業務部 Tel (02) 2368-7226 通路業務部 Tel (02) 2368-4938

台北書林書店 106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 2 樓之 5 Tel (02) 2365-8617

中區業務部 403 台中市五權路 2 之 143 號 6 樓 Tel (04) 2376-3799

南區業務部 802 高雄市五福一路 77 號 2 樓之 1 Tel (07) 229-0300

發行人 蘇正隆

出版經理 蘇恆隆

郵 撥 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bookman.com.tw>

經銷代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19 號

電話 (02) 2795-3656(代表號) 傳真 (02) 2795-4100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三一號

出版日期 2013 年 9 月初版

定 價 320 元

I S B N 978-957-445-550-8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得作者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部，電話：(02) 2368-4938。

編者的話

2011 年 12 月 1 至 2 日，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語言與比較文化研究學院與昆士蘭大學孔子學院聯合舉辦了「翻譯與跨文化交流國際會議」。會議主題為翻譯與跨文化交流，重點為英漢—漢英翻譯，包括筆譯和口譯。與會者包括來自 23 個國家與地區的近 150 名專家、學者和翻譯工作人員，並有五位來自不同國家的知名專家做了主題演講。大會安排了 25 場次的論壇，與會者在翻譯理論、文學翻譯、口譯研究、翻譯教學與培訓、專業領域翻譯和跨文化交流等六大領域宣讀了 100 餘篇論文，並圍繞著翻譯與跨文化交流的主題進行深入研討。主題演講者之一，中國翻譯協會主席黃友義先生稱：「這是第一次在講英語的國家舉行此類國際會議」，因此具有特別深遠的意義。這次國際會議對於促進翻譯研究、翻譯實務和翻譯教學的交流與合作，以及中英文翻譯事業在全球範圍內的發展，起了非常有意義的推動作用。

昆士蘭大學是一所研究型大學，在全球主要大學排名榜上均名列 100 名之內，過去幾年更在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欄的全球名校排名中位於前 40 名左右。昆士蘭大學的英漢筆譯和口譯碩士課程（Master of Art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簡稱 MACTI）是一個綜合口筆譯實踐、翻譯理論和研究的課程，培養了大批優秀翻譯人才。畢業生因其卓越的翻譯和研究能力而深受各界歡迎，就業領域包括外交機構、大學和翻譯培訓機構、世博會、政府部門和知名出版社。本次大會對有關大學與機構之間翻譯教學與培訓的交流與合作起了特別的促進作用。

大會以書籍的形式出版一本英文論文集和一本中文論文集。本書即為中文論文集，包含 17 篇論文，涉及文學翻譯研究、應用翻譯研究、翻譯訓練：教材與實踐、跨文化交流問題四個領域。書中的文章均經過大會論文遴選委員會精心挑選並經過專家審閱。編者希望本書的出版能推動英漢翻譯和跨文化交流的研究與教學。

「翻譯與跨文化交流國際會議」的籌備和召開，得到了中國國家漢辦的大力

支持和部分資助，同時還得到澳中文化協會會長馮文瑋女士和山東金彙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劉薇女士的慷慨資助，昆士蘭大學副校長遂高清教授蒞臨大會致開幕辭，台灣科技大學林茂松教授在本書的出版過程中給了很大的幫助。編者在此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高亮 (Leong Ko)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 Queensland, 4072
Australia

Email: l.ko@uq.edu.au

陳平 (Ping Chen)

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 Queensland, 4072
Australia

Email: p.chen@uq.edu.au

目 錄

編者的話.....	v
-----------	---

第一部分 文學翻譯研究

論詩歌翻譯的審美判斷模式.....	陳 凌	1
金隄之創造性翻譯研究.....	王金岳	25
包天笑翻譯策略之評析：從《馨兒》到《苦兒》.....	陳宏淑	39
試論文學語境下的成語翻譯.....	張傳彪	55

第二部分 應用翻譯研究

舊瓶裝新酒：資訊科技的新意舊字詞彙之翻譯.....	鄭 中	67
生態翻譯學視域下形合與意合的轉換.....	熊 俊	83
香港法例翻譯的語域分析.....	王 憲	97
從結構主義語義學角度看 「葷(菜)」與 meat 的釋義和翻譯.....	陳 平	111
中文政治術語的翻譯：對《2011 年中國政府工作 報告》英譯本的研究.....	劉曉梅	123
澳洲大學生對中國政治標語英譯之理解.....	姜文英、王禮彬	145
英漢文件翻譯校改問題探討.....	高 亮	161

第三部分 翻譯訓練：教材與實踐

論功能翻譯理論對中國翻譯教材建設的啓迪和應用 ...	陳 寧	187
語料庫輔助翻譯教學：從文獻到澳門的實踐.....	林燕玲	201

第四部分 在不同領域中對跨文化交流問題的探索

稱讚習俗在跨文化交際中的作用	謝鵬璇、侯金香	219
中國內地和台灣的電影片名翻譯：海峽兩岸跨文化 交際理論探索	江吉娜	231
澳大利亞住宅房地產廣告文本翻譯如何迎合中國消 費文化	江哲彥	251
跨文化交際中的語用失誤	李 瑋	279

論詩歌翻譯的審美判斷模式

陳 凌

南京郵電大學外國語學院，中國南京 210046

chenling@njupt.edu.cn

摘 要

本文在中西哲學和美學的比較語境中，對原文與譯文的資訊不守恆判斷、翻譯模式判斷，以及結構主義語言觀和經驗主義語言觀對翻譯判斷模式的選擇進行了論述，指出：「經驗性」是中國古典詩歌的詩性的根本保證，也是中國詩性語言觀的基礎；西方詩性語言觀則呈現出較強的「先驗性」。中國的漢字從創始之日起就是「人」這個主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直接體驗之結果，其重辯證邏輯、輕形式邏輯的思維特點，正是中國古代經驗性語言觀的哲學和美學之基礎，也是詩歌翻譯的審美觀念之根本。

關鍵字：先驗分析判斷、經驗綜合判斷、先驗綜合判斷、能指與受指

On Modes of Aesthetic Judgment in Poetry Translation

Ling Che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6, China
chenling@njupt.edu.cn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in the comparativ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the judgment on information non-conservation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translation mod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inguistic views of structuralism and empiric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xerted on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mode. Upon this, it points out: “EXPERIENCE” i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the poetics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but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poetic language as well, whereas the view of the Western poetic language shows a strong “APRIORITY”. In fac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initially the result of the direct experience of “man” by “observing the outer world, the universe, and the inner world, man himself”, its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ical logic being valued while formal logic thinking being despised have been the root of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empiric view of language and of the aesthetic concept of poetry translation all along.

Keywords: a priori analysis judgment; experience comprehensive judgment; transcendental comprehensive judgment;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篇首語

根據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知識論，知識的獲得需要通過判斷來實現。同樣，翻譯也需借助於某些判斷模式才能得以完成。

康德的知識論將獲取知識的判斷途徑分為三種：分析判斷、綜合判斷，以及先驗綜合判斷。康德認為，理想的判斷結果是：判斷中的賓詞必須來自於主詞，並且賓詞所蘊含的知識內容要多於主詞。

在上述三種判斷中，只有先驗綜合判斷才具備這兩個條件，因此，只有它才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具有創造價值的判斷方式。而在另外兩種方式中，譬如分析判斷，由於賓詞是從主詞中直接析出，因而它的信息量與主詞完全相等；綜合判斷中的賓詞，其信息量雖然要明顯多於主詞的信息量，但多出部分卻並非一定是從主詞中得出。

對於詩歌翻譯來說，譬如英詩和漢詩之間的逐譯，由於作為詩歌載體的語言分屬於不同的體系，其迥然相異的本質特性以及翻譯本身所具有的不同審美判斷模式，使得作為主詞的原詩和作為賓詞的譯詩，斷難做到在信息量上對等統一；此外，還必須從質的層面而不僅是從量的角度來界定文本的審美特性。譯者對於文本的審美判斷，其審美信息量的增減必然會伴隨著審美品質的提升或降低。換句話說，原詩和譯詩的等量問題必然會轉移到原詩和譯詩的等質問題。

詩人在創作時都要面對審美客體，而審美客體不僅具有審美價值，還具有審美潛質，有待人們對其審美提升。提升後的審美客體，具有了審美的主體性，便上升為審美物件，原來的客體性特徵也隨之上升為物件性特徵，審美因此就起了質的變化。

詩歌創作中的審美客體和審美物件，其相互轉化的方式不盡相同，而詩歌翻譯中審美客體和審美物件之間的轉換方式卻只有兩種：移植原文本的固有模式；或用具有譯入語特徵的轉換方式取而代之。要使譯詩在質的層面上獲得審美提升或消融，捨後者則無它。須知，詩歌翻譯的創造性空間，取決於譯詩從量和質方面對原詩所作的變異程度。

一、原詩與譯詩之資訊不相等

首先，原詩和譯詩字面義的信息量並不相等。請比較唐代詩人李商隱的〈無題〉之一及其翻譯：

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
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

——（唐）李商隱

李商隱寫了很多〈無題〉，這是其中之一。李商隱的〈無題〉詩，似乎都是描寫豔情，實有所指，但又不便明說。這一首也不例外，追憶曾經的豔情。先寫宴會時間與地點；再寫兩地相隔，情愫相通；然後是相聚的綿綿情意；最後寫別後離恨。豔麗而不流俗，情真而不癡狂。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是全詩的精華，傳誦千古，至今不衰。情人間心有靈犀相通之說，由李商隱這一絕唱終成不朽經典！試想人生中若有心心相印的知己，該是何等的慰藉和欣喜？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喻指身上雖沒有彩鳳那雙可以飛翔的翅膀，心靈卻像犀牛角一樣，有一點白線可以相通。詩人顯然是在寫自己的情感世界：他同愛人分處兩地，不能相見，所以說「身無彩鳳雙飛翼」；然而，雖不能相見，兩人在思想感情上卻始終契合、相通，「心有靈犀一點通」即指此而言。據古書記載，有一種犀牛名通天犀，因其角有白色如線貫通首尾，被看作是靈異之物，故稱靈犀，「一點通」的想像也由此而來。清人馮舒說：「次聯襯貼流麗圓美，『西昆』一世所效。」（見《瀛奎律髓匯評》），可見其影響之深。

楊憲益先生將這兩句譯為：

We can't fly wing to wing like a pair of phoenixes,
Yet our hearts closely linked beat in harmony.

——楊憲益 譯，2003：287

譯詩第一句基本與原詩對等。兩個意象「鳳凰」和「鳳凰的翅膀」在譯文中都得到了反映。然而，「彩鳳」中的「彩色」卻未曾得到體現，譯詩的信息量就遜色於原詩了；後一句譯詩更有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靈之物「犀牛」和據說可心靈感應的犀牛的「犀角」都無處可覓了，楊先生用了轉借的手段，從其隱含的喻義（figural meaning）層面，將有靈之物「犀牛」和其「犀角」轉譯成「緊緊相連的心臟在和諧地跳動（our hearts closely linked beat in harmony）」，以此遙譯原詩中以靈犀所具有的特徵來暗喻兩顆心靈之間的相交相通。

再看另一譯：

Our bodies have no colorful phoenix-wings to fly side by side;
Our hearts are linked to each other as if by the line in the magic horn.

——劉若愚 譯，1969：8

原詩採用顯象隱義的方式，「顯」意象、「隱」涵義。正是這辯證的「顯」與「隱」，才生發出無限的詩情！就在這一「顯」一「隱」當中，詩人完成了對詞語的審美提升。但在譯文裏，這種提升卻蕩然不見了蹤影，代之而起的是「顯」和「隱」的同時出現。原文中原先處於暗處的東西彰顯了出來，由此增加了譯文的信息量，導致了譯詩和原詩在信息量上的不均衡。

看得出來，劉先生是努力想讓譯詩忠實於原詩，卻仍然難以做到譯詩與原詩在信息量上的對等統一。

那麼打破原詩意象之間的關係呢？縱使如此，也難避譯詩與原詩所含資訊的不均等。

請看下例：

Although on Wings of Phoenix we'll never reunite,
With Sacred Unicorn throb our two hearts in thrall.

——許淵沖 譯，1955：399

顯然，在譯者的心裏，李商隱的這首〈無題〉成了詠歎：雙方原本期盼乘

著「鳳凰的翅膀」(Wings of Phoenix)來相聚,卻從未能夠如願以償,所以,只能想像分居異地的兩顆心由「神聖的獨角獸」(Sacred Unicorn)「維繫在一起而痛苦地跳動」(throb ... in thrall)!從原詩中化作彩鳳的雙翼,到譯文中「乘著鳳凰的翅膀」(on Wings of Phoenix);從原詩中具有靈異功能的犀牛之角,到譯詩中「神聖的獨角獸」(Sacred Unicorn),不光「比翼雙飛」的動態景象沒了,靈犀角上那條貫通到尾的白線所暗喻的「心靈感應」也不復存在了。由此可見,譯詩與原詩之間的意象轉換,丟失的不僅是原詩的內容,還丟失了原詩的神韻。

三位譯者雖然面對同一個翻譯物件,但其不同的審美體驗卻導致產生了不同的翻譯結果。譯文的差異首先表現在信息量上的不同。這說明什麼?說明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很難謀求譯文和原文之間的信息量平衡。原因又是什麼呢?三位譯者雖然面對同一經驗物件,並且譯文也都是其借助翻譯這個經驗過程而獲得的對於此物件的知識,但在其最初的翻譯階段,不同的譯者,獲得的卻應該是相同的感覺和知覺材料,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裏,原詩中「彩鳳」、「雙飛翼」、「靈犀」的意象,在上述三位譯者的眼中應該大體一致,然而,這個經驗「物件作用於我們的感官而引起感覺、印象」之後,譯者還繼續利用自身的「知性對它進行加工、整理、綜合,便得到關於物件的知識」(楊祖陶,2001:49)。顯而易見,當譯者利用各自的「知性」對翻譯物件進行加工的時候就產生了種種差異。

既然構成經驗物件的原詩的感性材料是可靠的,譯者對經驗物件的感性認識也差不了多少,又怎麼會造成知識結果的差異性?原來,在獲得關於原詩的感性認識的最初階段,不同的譯者會具有相似的感性經驗和感性印象,但是,到了用所謂「知性」來對其所獲得的感性材料進行加工的階段,不同的譯者就會選擇不同的知性內容融進感性材料中去,因此就產生出不同的知識結果。

「康德認為,既然人的知識是由知性改造感性印象這樣一些粗糙的材料而形成,那麼顯然,知性用來改造感性材料的東西就是知性增加到感性印象上去的東西,這東西就有可能不是來自感性印象,而是來自人的認識能力的成分。」(ibid)顯而易見,在認識過程中,雖然經驗物件會基本相同,但在知性的加工過程中,經驗物件就會隨著人的主觀性差異而產生不同。這種認識的主觀差異性,導致了知性在對經驗物件加工、改造之後,出現不同的認識後果。

康德的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為我們對這個現象的剖析提供了可資借鑑的闡釋工具。

二、原文與譯文之受指與能指

千百年來，古今中外的譯者都力求譯文對原文的資訊等量、效果等效和價值等值，人們視之為理想翻譯。實際上，原文相當於判斷過程中的主詞，譯文則相當於賓詞，從原文到譯文就是從主詞到賓詞的判斷。理想的翻譯判斷，作為譯文的賓詞，應從作為原文的主詞中直接分析得出，賓詞的內容因而始終包含在主詞之中，這種翻譯判斷謂之為分析判斷。但是，「這種判斷不過是把早已包含在主詞中的東西推引出來，所以無需依靠經驗，就可演繹得出，並且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李澤厚，1999：71）顯然，這種類型的分析判斷，確實可以求得譯文和原文之間的同一，以保證譯文和原文在信息量上的對等。而且，譯文和原文，不光在內容上可以趨於相等，翻譯結果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也會得到實現。

然而，詩歌翻譯，尤其是漢詩英譯，卻絕難做到譯文和原文之間的這種對等統一。上引三個譯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譯文或者丟失原文的固有內容，譬如第一個譯例就丟失了「彩鳳」中的視覺印象「彩」，還丟失了意象「靈犀」，卻增加了心臟「和諧地跳動」（beat in harmony）。雖然丟失的內容較之增加的要多，卻是屬於信息量上的負增長；或者顛倒原文的邏輯關係，譬如第二個譯例交換了原詩中「顯」和「隱」的位置，彰顯了原來隱於暗處的東西，「顯」、「隱」之間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信息量也就隨之起了變化；或者替代原文的文化意象，譬如第三個譯例中，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意象「unicorn」，就替換了原詩中獨具中國文化色彩的意象「靈犀」。

詩歌翻譯中，譯文和原文在信息量上的「對等統一」只是人們的一廂情願，由此可見一斑！

除非從原文「普遍而必然地」推導出譯文，才能擺脫譯者主體審美經驗的干擾。所謂利用「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就足夠了。」（ibid）

然而，存在純粹的可以不受主觀經驗影響的先驗性的邏輯手段嗎？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詩歌翻譯，總是無法避免譯者主體經驗的參與其中。原文和譯

文的關係，也即主詞與賓詞之間的關係，就成了一種綜合性判斷關係，翻譯過程中就有必要動用綜合判斷的手段，來實現語際之間的轉換。

這種連接作者和譯者、原文和譯文之關係的經驗綜合判斷，如何完成從原文到譯文的轉換？

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得瞭解「先驗分析判斷」這一所謂的理想判斷方式在翻譯過程中的特徵。眾所周知，西方語言重形式重邏輯，從單詞的構成到句子成分的成立，從句與句，到段與段，再到篇章與篇章，其間都存在著嚴謹的邏輯關係，這種嚴謹的邏輯，孕育了西方人對語言形式的崇拜，因而產生了「邏各斯中心主義」。

這種對「邏各斯」的崇拜和強調，衍生了西方人對語言、邏輯以及處於邏輯關係中的單位概念的推崇，「在這樣的源頭下，西方思想哲學傳統便逐步形成了這樣的特點：……重理性思維和抽象思維的同時還重邏輯分析和立論推理，……。」（陳凌，2006（6）：141）這種風氣從蘇格拉底起，逐步發展形成了現在西方的聚訟傳統，這種推崇辯論的傳統集中體現了西方的能指主義思想，其實質就是「邏各斯中心主義」。所以，「作為受制於社會文化和思想哲學體系的翻譯傳統，其思想和理論無疑會帶有上述種種特徵。譬如古羅馬時期奧古斯丁的語言學翻譯觀、文藝復興時期伊斯拉謨的人文主義翻譯觀，布魯尼、維弗斯、韓弗理、曼內狄、塞巴斯蒂諾、杜貝利、于埃等翻譯理論家關於翻譯性質的認識，以及文藝復興以來出現的關於翻譯原則、翻譯方法、翻譯類別等等的各種觀點，諸如多雷的翻譯五要素、德萊頓的翻譯三分法、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施賴爾馬赫的翻譯二分法、雅可布遜的翻譯三類別等等，都從不同角度反映出西方思想哲學傳統的重推理、重立論、重抽象思維和重邏輯分析的特點。」（ibid）

西方人愛辯論，但是很多時候，辯者卻缺乏實際的經驗內容，只不過是證據的組織者和分析者。辯者所關心的，是從能指到能指的邏輯關聯，這種邏輯關聯缺乏實在的經驗內容，這就是分析判斷的最為基本的特徵。

假若原文是沒有經驗內容的能指符號，譬如「金山」，如果翻譯成英文，就可以直接轉換成也是沒有實際經驗內容的符號，即「gold mountain」。這種轉換，使得原文和譯文在信息量上達成了對等統一，因為除非加進各自的主體性感

受，否則雙方都難以「經驗」得到其具體的所指內容。這實際上只是一種能指間的轉換，因此，不會增加任何東西也不會減少任何東西。這就是典型的「先驗分析判斷」：不增加內容、無經驗干擾、判斷具有普遍性與必然性。

如果只是從能指到能指地進行語際轉換，原文和譯文之間的關係就是分析判斷關係，利用這種關係來進行翻譯，就可以實現對等統一的翻譯理想。然而，語言和語言之間並不是能指和能指的單一關係。更何況相對於英語，漢語又是極其注重所指的語言，曾有人把所指的這一經驗內容稱為受指（張遠山，2003（3）：4-13），因而也可以說，漢語是以「受指主義」為主導的語言。那麼，以能指為本位的西方語言，和以受指為本位的漢語之間的轉換又有著什麼樣的判斷特徵呢？

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就像一張紙的兩面，包含能指和所指兩個部分。（索緒爾，1996：100-102）這兩個部分都是邏輯性的客觀存在。所謂邏輯性，就是說它們都由語言的邏輯結構關係所決定；所謂客觀存在，則是指它們都已是固定下來的、處於常態之中的存在物，相對穩定。在常規詞典中，每個詞條的詞頭就是一個能指，而各項釋義就是所指，能指之所以會有所指，就是因為它被放在了某種結構關係當中。

在結構主義語言觀看來，能指和所指都是客觀性的，沒有主觀的經驗性的「授意」。這種結構主義的語言符號觀念，後來遭到了後結構主義以及解構主義的質疑。後者認為，能指是在所指的鏈條上不停地滑動，在差異中持續地延宕，所以不具確定性和穩定性。

這種觀點倒可以解釋後結構主義何以會同老莊的道家思想在語言觀上有著不謀而合之處——因為它們都質疑，甚至否定語言的確定性。

這種不穩定性，正是由於主觀經驗的干擾所造成。中國人更加關心的是經過主體授意後，語言的能指符號所具有的經驗物件性的所指意義，也就是它的「受指」；西方所注重的「所指」，則是來源於由能指的結構關係而固定下來的「客觀所指」。國人所強調的，是由主體經驗授意後獲得的「主觀受指」。在翻譯過程中，以「主觀受指」為核心的漢語，與以「客觀所指」為核心的西方語言之間的相互轉化，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這種轉化勢必會造成信息量上的增減。

詩歌翻譯所經歷的往往是一個經驗性的判斷過程，特別是在用西方語言的

能指的先驗設定性特徵，來表述漢語詩歌中受指的經驗性特徵的過程中，情況更是如此。如果說，西方語言之間的轉化是以能指為中心，那麼，這樣的轉化一般都是在語言的先驗結構形式上進行的轉化。這種語言之間的轉化判斷，能夠保證其轉化結果，在知識內容上取得普遍性和必然性。

相對而言，從漢語過渡到西方語言，卻是一個由受指到能指的過程，其中充滿了由譯者主觀審美經驗的參與而造成的不確定性，在這個過程中，貫穿於其中的是綜合判斷形式。這種判斷形式沒有了分析判斷的先驗性、普遍性、必然性，以及主詞同賓詞之間的同一性，而只有經驗性、擴充性，並且不具備普遍必然性的保障。

在以綜合判斷為特徵的翻譯中，作為主詞的原文和作為賓詞的譯文，兩者之間不是關係相同，而是關係相通。這種判斷方式，既不會像從「金山」到“gold mountain”那樣純粹在能指上轉換，也不會像從“Milky Way”到「銀河」那樣純粹在所指上轉換。因為那兩種轉換都是同一性地從原文中分析出譯文，沒有主觀經驗的參與，所以說，這些轉換只局限在語言的先驗層面而沒有譯者的經驗內容。雖然分析判斷模式可以保證語際轉換的同一性、確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同時也失去了語言的生動性和鮮活性，在詩歌翻譯中，特別是在漢詩英譯中，主觀經驗的干擾絕對不可或缺。

但是，這同時也帶來了另一個難題：以綜合判斷作為原文和譯文的關聯方式，儘管有著鮮活性和生動性，然而卻不能保證其擁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這種翻譯究竟有沒有可能，像康德的先驗綜合判斷那樣，讓譯文既能對原文進行擴充，同時又能保證這種轉化「普遍而必然」呢？這種判斷模式，是否又會像尋求原文與譯文的絕對等同那樣，成為一個不可企及的夢想？

康德的先驗綜合判斷，既不同於先驗的分析判斷也不同於經驗的綜合判斷，而是融合了這後兩種判斷的優點，是一種集大成式的判斷模式。這種判斷「適用於一切場所、一切物件、一切經驗，它不依賴於任何具體的經驗而普遍必然地有效。」（李澤厚，1999：74）康德利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例子，證明了先驗綜合判斷的可能性，其所具有的客觀有效性，不是通過歸納經驗所提供，也不像分析判斷那樣直接從主詞中分析出來，但是，它卻和綜合判斷一樣可以增加新的內容。